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资产阶级新闻观批判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资产阶级新闻观批判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产阶级新闻观批判文选 /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561 - 6

I. ①资… II. ①中…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文集

IV. ①G21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7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刘景钊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71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将会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当前，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批判“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观等错误思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论的鼓吹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家就是典型案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显然不是“福音”或“救世良方”，而是无尽的动荡和灾难。这些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证明，根本就没有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永恒的价值观。价值观念从来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产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相联系，所谓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普世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独立存在。一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论，是一个有特定政治含义和具体企图的思想陷阱，其针对我国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而代之以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宪政民主”观是近年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涌现的又一股错误思潮。在党中央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的背景下，有人趁机兴风作浪，故意混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民主”的本质区别。“宪政民主”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政治理念，逐渐演变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政治和制度主张，完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他们鼓吹的“宪政民主”，实质上是要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法治、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代之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搞“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制”，一句话搞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体。“宪政民主”显然绝对不是什么“普世民主”或“普世价值”，不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我国是具有本国具体历史和现实特点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适合什么样的制度，适用什么样的模式，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渗入进来的。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念，通过鼓吹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绝对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开辟全球空间。新自由主义先后被英、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捧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宝座，逐步由经济思潮转化为附带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意识形态主张，并迅速向拉美、亚非、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广泛蔓延。自9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先后导致一系列引进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深受重创，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苦不堪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随即蔓延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十年来，为了走出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相互拖累的发展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被迫采取加大政府开支、扩大基础建设投入等政府干预政策。可以说，世界金融危机这场肇始

于美国的“经济灾难”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这一破产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可规避性、可防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告诉人们，只有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同时用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西方新闻自由观是资产阶级在欧洲大陆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形成的，曾经为资本主义打倒封建制度的传播武器。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新闻自由的进步因素在西方传媒界越来越被淡化，越来越变成一种巩固资本主义统治、打压社会主义和一切寻求国家独立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国家的武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所谓的国家核心利益的诉求，肆意扭曲与歪曲新闻自由，使新闻自由成为“为我所用”、“唯我独尊”的“法宝”。这也充分暴露了西方新闻自由观的虚伪性、自私性、两面性和独裁性。为了针对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新闻自由等价值观包装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全人类“适世价值”观为幌子，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以此进行思想控制，进而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当然，对充满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错误思潮的否定与批判，并不等于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于我有用的思想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汲取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对错误思潮予以鲜明的批判和抵制，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组织院内外专家学者，围绕错误思潮的源流、本质及其危害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与批驳，推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论著，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

本套文选选编了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一些重点文章。这些文章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各种谬论展开了具体而深入的批判。

我们期望这套文选的出版，能够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将自身原有的理论素养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是为序。

王伟光

2017年10月

目 录

一

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	赵月枝(3)
西方新闻自由与国家核心利益	尹韵公 王凤翔(13)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和西方新闻自由再审视	童 兵(20)
从“《查理周刊》事件”透视西方新闻观的现实困境和 逻辑悖论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课题组(37)
从宪法《第一修正案》到“窃听门”事件：关于美国新闻 自由的反思	於 春(46)
从《世界新闻报》事件看西方的新闻自由、社会责任与 资本至上	黄 璐(57)
试论美国新闻业言论自由角色与结构自由角色之 冲突及理论根源	姜 华(62)
西方新闻自由思潮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刘玲玲 王 岩(78)
美国新闻自由并非没有边界	毛 莉(89)
真理还是神话：西方新闻观的真相	王 强(92)

二

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发展史的评述与反思 郑保卫 李玉洁(103)

厘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

——兼论对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 童 兵(123)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赵月枝(129)

为什么美国媒体会“遗漏”重要新闻? 李希光(145)

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

——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 王维佳(155)

美国新闻公评人制度:新闻道德控制的幻象 单 波 陈俊妮(167)

从“雷诺兹特权”案浅析西方新闻的工具性 王丹妮(178)

“不死的上帝”在哪里?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

虚伪性 唐润华 文 建 张 宸 申 琰 陈 怡(185)

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困境及其在中国生发的社会土壤

——以 BBC 为例 常 江(194)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悖论及其启思 刘文辉(202)

警惕西方新闻观的侵蚀 曹仁义(214)

三

美国总统与记者的角斗 刘建明(221)

再塑新闻魂

——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科学与价值 李 彬(230)

“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神话

——美国媒体价值观传播的历史脉络与实践

经验	史安斌	廖骝尔 (250)
“川普”奇观与美国政治新闻的困境	史安斌	周迦昕 (259)
西方媒体真的不讲政治吗?	张涛甫	郑保卫 (267)
从美国大选报道看西方媒体的局限性	黄楚新	(271)
为何美国媒体漠视“民主之春”	詹得雄	(275)
民主失算与媒体失范	李新峰	(281)

—

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

赵月枝

国际话语体系中讨论问题框架的置换

中国官方和知识界的某些人，尤其一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一点在对美国的理解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更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官方互相比劲，你跟我急我就跟你更急；你越批评美国模式和西方“普世价值”，我就把美国模式更加理想化，把“普世价值”更加神圣化，从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很典型的文化领导权旁落的表现。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是有一定文化领导权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指着美国鼻子说，你们对本国的黑人如何如何，你们的人权状况有待改善。当时，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话语体系或两种“普世价值”，以及背后的两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对立与竞争。然而，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建立，战后国际话语体系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被置换成了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在民主和专制的二元选择面前，民主有着不言自明的道义制高点，而民主又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样一来，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了唯一、当然的“普世价值”体系。

毋庸置疑，在这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媒体和学界是最主要的场域。

随着讨论问题的框架被置换，讨论问题的词汇自然也被改变了。在这方面，国内媒体和学界比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学术界，诸如“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阶级”这些词，现在都还常见。但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些词汇却变得特别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过程中，审稿的编辑一定要我把“资本主义”改成“市场经济”，“阶级”改成“阶层”。

“新闻自由”诉求不等于人民的表达权利

我们需要在以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理解当下的“新闻自由”话语。在这一语境下，“新闻自由”不仅是占据宪法和道德制高点的理所当然的原则，而且不言自明地意指：（1）新闻报道不受政府干预；（2）开放媒体市场，允许私人办媒体。这样一来，只要中国的媒体还是国家所有，只要中国不开放私人媒体，那就没有新闻自由。

泛泛而谈，就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自由也是个好东西。但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什么？对此，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是为了民主自治和实现全体人民的表达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民的表达权利都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媒体不受党政权力控制、开放媒体市场和实现媒体私有化。在“新闻自由”诉求与人民的表达权利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和鸿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

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

我在此指出这一点,无意重构“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而是通过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具体历史实践的相关讨论,加深对新闻自由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话语霸权。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国“新闻自由”言说的理论和世界历史及现实的参照。

例如,我们的新闻教育至今还在用美国冷战新闻学中最富反共色彩的教科书,即斯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权利:反思报刊的四种理论》(*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该书从学术角度将《报刊的四种理论》批得体无完肤。然而,这本美国当代学者的批判之作在中国被视而不见^①,而《报刊的四种理论》至今仍被列为经典。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新闻媒体的自由?

任何一部宪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新闻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拥有的已经成为跨国财团的媒体机构的自由。当下流行的“新闻自由”言说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相关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体: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作为特定社会组织机构的新闻媒体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没有明言保障新闻机构的自由。这里的作为个体的“公民”概念如何与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作为国家主体的集合性的、有明确阶级含义的“人民”概念相衔接,正是问题的

^① 汕头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翻译出版了《最后的权利》。

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的舆论中，新闻机构的自由似乎成了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同义语。当然，由于新闻机构从事言论表达和出版，其自由可以被认为是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延伸。但是，无论是相对于作为集体的“人民”还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表达和出版自由，媒体机构的表达和出版自由都是延伸性的或从属性的。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宪法序言和总纲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媒体不但为党和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从事任何商业牟利活动。但过去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媒体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广告资助媒体是“经过算计的自由化”

西方把公民出版自由的实现途径定义为个体公民自力、媒体的自由。而这种媒体又按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私人公司拥有的，以广告为支撑、以营利为主旨的媒体。如此，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用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此相关，广告支撑的媒体市场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运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钱主”逻辑运作的。传媒资本与广告商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低消费能力的劳工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媒体注资和投入广告费用。

然而在国内，包括媒体政策部门、学术界和主流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媒体的市场机制理解为政治上中性的经济化约主义。更有甚者，媒体市场中的消费者被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市场民粹主义立场。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国报业史。

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疏”和“堵”的策略选择。面对政府的垄断经营和高印花税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人阶级出版非法报纸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英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的报纸打压下去。保守派主张“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则主张“疏”，放开媒体市场。结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放开市场后，那些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因为没有广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渐渐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 *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工人阶级的媒体，而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一书中有深刻分析（这本书在国内早有翻译）。卡伦引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拥有 474 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报纸——《泰晤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读者总人数多出将近一倍。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是内在于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机制的媒体的阶级倾向性问题，与商业化媒体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立场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一旦媒体是由广告商资助和被纳入市场化以及资本化运作的轨道，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就体制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能够左右的。当然，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很重要。比如，当下国内一些媒体和网络在报道“八卦新闻”和负面新闻时，是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的。在西方具体的媒体运作